

DUKU

读库

1202



DUKU1202

DUKU1202
2012.4.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库1202/张立宪主编. 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 2012.4

ISBN 978-7-5133-0665-2

I. 读… II. 张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17-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(2012) 第065556号

读库1202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88310888

传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83398809

官方网站: www.duku.cn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

印刷: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645mm × 925mm 1/16

印张: 20

版次: 2012年4月第一版 2012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33-0665-2

定价: 30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DUKU1202 · 目录 ·

01-46	小九	大 力
47-69	家师逸事 (续)	张 梅
70-127	广告记忆	张家荣
128-174	邱岳峰的声音	张稼峰
175-190	魔旦	蔡小容
191-196	到青海去	王仁权
197-207	红色流苏	庄加逊
208-227	生死记：蒙克	李树波
228-245	植物三国志	沈胜衣
246-317	辰年记忆	影像志

小九

大 力

我站她旁边，当时什么也没多说。我连眼泪都早就没了。

2003年，那是个仲秋的午后，我在报社办公室，忽然接到个陌生的电话，嗓门儿特大：“喂，张记者，你好！”我问：“哪位？”他说：“我知道你是谁，但你肯定不知道我是谁。”

我纳闷儿的工夫，电话里又说：“你还记得宜兰吗？罗东镇沧前街一百一十三号？”

“什么？”我难以置信，不禁追问，“你是谁？”

听上去，是个中年的声音，京腔。并不等我多想，他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小峰向我说起你。我叫钮益惠，今年六十八，前不久刚从台湾宜兰靖庐放回来，我的牌号是5106。这是我第二次‘偷渡’台湾了。我有事对你说，你想听听吗？”

我放松下来，甚至顿感亲切。2000年5月到来年1月，因为参加一次民间航海，我被扣在台湾宜兰的“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”，一共二百四十八天。在那里与数百个大陆客成为患难之交，其中就包括叫小峰的弟兄，他在里面做“公差”，暗地里帮了我们不少。

我忙问：“咱们怎么见面？”他家住京城东南五环的大羊坊，离我们这儿不近，但他说：“我熟，北京咱哪儿不熟啊。你等着吧，我马上找你去。”

因为莫名的急切，我看了表。正好四十分钟后，楼下大厅保安来了电话，说有人找。一出电梯，看过去，先是望到一个高大魁梧的背影，寸头，休闲装束，旅游鞋，背的双肩包，看上去四十来岁。待此人转过身来，看到了鬓边的白发和脸上的沧桑。无须介绍，他大步跨过来，一双粗硬的手握住了我。无法相信，他会有六十八岁了。

据我所知，一个时期以来私渡台湾的大陆客，多以福建等省的打工仔为主，也有部分其他原因入台的女青年。而面前这位六十八岁的北京大爷，因为什么想起来要“偷渡”台湾，而且还是两次呢？那么，他的人生命运究竟跟海峡对面有着什么样的不解之缘呢？

房间里很安静，我们对坐在落地窗前，楼下的三环路上倒是车流如织，而窗户隔音，外面的都市好像渐渐远离，渐渐模糊。我们就一直聊到天黑得都看不大清对方的脸，只剩下那些故事在眼前缓缓地清晰起来。

我们家

我这个人，从小用我们村儿那些人的话说：聪明透顶，坏事儿一学就会，就是不学好。我是1935年阴历正月二十二生人，上面四个姐、一个哥。按钮家同辈儿排行，我数老九，都叫我“小九”。再到许多年以后，就成了九爷。

因为我是老小，吃奶吃到四岁多，我都记事儿了。后来我妈还喂我，我往我妈奶头上抹红辣椒，这一下儿自己断了奶。我妈疼我，最

听我话，除了我爸别人谁也不敢管我。要叫我说，母爱是天底下最糊涂的爱，不管怎么样都疼你。我母亲钮张氏，传统的家庭妇女，得我的时候她四十岁了。那时候得子是宝贝，但是我妈为我受了一辈子的罪。

我们老家在通县南边张家湾的垛子村。我家祖传中医，我爷爷是有名的中医，我父亲这辈儿应该学医，可他没学成。赶上乱世，孙中山闹革命那会儿，我父亲到广东参加过国民革命军，具体干什么咱不知道，那时候还没我呢。再往后他回来了。到日本人来的时候，我们家就甭说了，麻烦大啦。

姓钮的在当地是大户，但不算地主，我父亲弟兄七个，应该说是殷实人家，周围的人都知道。我父亲钮永绪，话不多，在外面没有不说他好的，但我特怕他。在家绝对是他说了算，说一不二，大事儿他全拿主意。他也勤快着哪，家里什么农活都做。我们都到城里住的时候，他一个人还留在垛子农村，忙家里地里的活。那时候我父亲给我和我哥一人盖了一个院子，每个院子十八间房。我们有房子住，家里挺好的。

我爷爷是有威信的中医大夫，他治好过邻村一个地主的绝症，那人要送我们家一所房子，我爷爷没要，说我们有房住。后来那人就在我们村建了座庙，里面的器物上都刻了我爷爷的名字：钮建昆。我爷爷在那一带威信特高，有一年做寿，我六叔给办的，吃了二百口猪，你算算来了多少人。

我六叔，人称“垛子钮六”，在通县称得上一霸，而且还霸得厉害。他不是去抢，而是保着最大的地主张八爷。钮六最狂的时候，手下两千多条枪，连机关枪都有，鬼子来了都没轻易碰他。

说起我们垛子村的那个大地主，他排行老八，我就知道人家都叫他“张八爷”。他家有六座大院，村中心两座，东南西北各一座，雇了七十来个长工。到收粮的季节，他家收粮的“天囤”搭得比大树还高，能有现在的高压线塔那么高，出了通县县城还离二十多里地就能瞧见。光打这天囤，工程就大了，那时候没有卷扬机，一百六十斤一袋的粮食全靠三个人扛上去。日本人为什么都没从他这儿拿走粮食？

我六叔钮六带人给保着哪。

但是这个地主有一样，他做得特善良，村儿里没有一个说他坏的。本村谁家要是死了人，只要到他那儿磕个头，就给一口棺材、两斗小米。一到冬季，他就在村里发一百套棉衣；还开粥场，叫伙计们架起大锅施粥，附近各村的穷人都能来喝一冬的粥。

我们村，还有附近村的人都说这个地主好。他骑毛驴出来的时候，见着谁都下来，见着穷鬼也不例外。张八爷这个人很有脑子，土改前的三年，他就开始卖地，派出去好几个账房先生，把地都卖了，把东西都派发了。然后他拍屁股走人，进城去了，再没露面。据说到共产党进来的时候，他家把这些财富都交公了。所以土改呀，斗地主、镇反，都没挨着事儿。但是后来，直到“文革”那阵儿，才有人又想起来，揭发张八家可是个大地主。八爷早死了，把他孙子由城里揪回来，拉回垛子村批斗，也没少折腾。

我这一辈儿的大哥钮益山、二哥钮益林，都跟着六叔钮六干。有一回他们经过北平哈德门外的火神庙，就是现在的崇文门外幸福大街，看见警察楼子里打人，打得很惨，他们看不过去，进去把伪警察收拾一顿，下手重，出人命了。正闹着呢，日本宪兵赶来，钮益山、钮益林都被日本人抓走，毙了。

日本人最想抓我六叔。钮六这么厉害，日本人能不办他吗？宪兵队请我爷爷去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没什么事儿回来了，想让他劝降钮六。过俩月，又通知叫我爷爷去宪兵队，大伙儿都劝他别去了。结果他说不去不行，还是去了，就再没回来，连尸首也没见着。

我们钮家跟日本人结了仇，钮六还能被劝降吗？本来我家祖传中医的，到这会儿早已经玩枪杆子了。后来日本人动了心眼儿，从关外东北拉来土匪，包围了他。钮六不服软，一直打，最后退到垛子村北边的岗子上。知道钮六在上面，日本人非要逮活的。钮六的两把盒子枪剩下最后的子弹，给自己了。日本人叫人把他抬到村子里，照了张相，好好埋了。想当初，抗日的队伍要是收编了钮六这伙人，那我六叔不也像贺龙什么的，肯定也是个老革命，至少也和《独立大队》演的差不多吧，应该是另一种命运了。

再说我亲哥，钮益培，钮家同辈儿排行老三，叫他三哥。他有文化，上的育英中学，好像是在保定上的陆军学校，长得挺帅。听说他参加过台儿庄战役，后来到了重庆，日本人一投降，他由重庆飞回北京，属于接收的，做了第五补给区的副官。华北好些部队的后勤物资都在他们那儿领，他要是上哪个军需库房去检查，马上就给他送东西。你想想哪个仓库能没有搞鬼的？再后来，他还做了参谋总长陈诚北京公馆的副官。那公馆就在王府大街（今王府井大街）东厂胡同里面的太平胡同，我哥带我进去过。他经常能开车回家，所以那会儿我就坐过小卧车，我知道有“道奇”、“雪佛兰”。那阵儿满北平也见不着几辆小卧车。

这时候我们家早搬到哈德门内，东单牌楼北的新开路胡同戊字四十一号了。我们那座大院听说以前是日本人住的，里面停三辆大马车没问题，大门一开就能进去汽车。一排五间大北房，屋有多大？每间屋里能摆四张麻将桌。我记得冬天大洋铁炉子就有三个，多大？有半人多高，反正添一次煤就是二百斤。我们家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缺，生活够阔。跟我们南边隔一条道的那座大院，围墙又高又结实，是警备副司令家的宅子。

垛子村和大羊坊都有钮家的人，我们城里的家就等于是这俩村亲戚的公馆，他们从乡下进城，都来我们家，管吃管住。他们赶着铁轱辘的大马车来，按规定不让进哈德门，因为哈德门外都是土路，哈德门内才是柏油路。我哥叫俩当兵的去接，当兵的一坐在车上，没有不让进的。

在我们垛子村，都说我哥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总抓壮丁，谁家摊上派兵了，拿出十五石玉米才能免。村儿里人到家来找，求我哥，只要沾上点儿亲的，我哥就说：“得了，给领身儿军装去吧。”他们那儿有个汽车队，队长跟我哥好，他一百二十号人有几十号是吃空饷的，平时不用来，上面长官大点名查名额的时候你得来一下，到时候转一圈儿就不用当兵了。有的在自家地里干活都穿一身军装，穿军装谁还抓你壮丁啊？——要这么说，国民党军队根本就没有八百万。

我

要说我，那就别提了。从小不学好，好事儿甭让我学，坏事儿一瞧准会，一瞧就上瘾。那时候我们家已经在北平城里住了，我干什么都行，就是不爱上学，净逃学，早上背书包出去，根本就没去学校，跑街上去了。

东单牌楼的西南角，现在的体育场那边，过去是一大片空地，叫东大地。美军的兵营在东交民巷，他们就到这片空地操练，我也跑那儿看，因为他们练得特别整齐，所以好多人都喜欢跑去看。后来“沈崇事件”就发生在那儿。到共产党围困北平城的时候，外面的机场失守不能用了，东单这片空地就当成临时机场。飞机在这儿起飞肯定够危险的，那也没办法，城里再找不出这么大的空地了。最后国民党的不少高官和将领就是从这儿跑的。

太庙和中山公园前面各有很大的三座门，路上通有轨电车。那时候天安门城楼上什么也没有，大门都不关，城楼随便上，我还跑到天安门城楼上掏过麻雀呢。日本人占领的时候，中南海是开放的，可以在里面的湖上租船划船玩儿，我常去，用不着大人带。后来跟租船的混熟了，我划船都能不花钱。有时候我也跑到离家不远的南岗子天主教堂里面，找洋姑奶奶（外国修女）玩儿去，那些洋姑奶奶对我们小孩儿可好了。

那会儿我看的电影特多，我特迷电影。我们家不是挨着大华电影院嘛，当时大华、大观楼、新新，这些电影院在北京算最高级的，我就相当于在大华电影院长大的。北平警备司令部在外交部街，离我们很近，我哥有个朋友是里边的，所以我家也总有送来的“慰劳票”。电影院、戏院不是都得有当兵的把守嘛，给电影院派几个宪兵去坐着，到时候就上赶着送票来。他们别人没工夫看，都是我拿了去看。就算没票我也能进去，挨着电影院有墙有大树，我爬树从二楼的窗户就钻进去了，人满了我就坐地上，什么好电影也不耽误看。

演电影时我进去就不出来，一场放完我还在里面藏着，下场接着看，多的时候，一部电影连看四场，就是看不烦看不腻。净看外国片

儿了，像《一千零一夜》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是美国的第一部七彩片儿。里边有水晶楼梯，从底下都能看到人的脚，女主人公每次出现都会换一身漂亮衣裳。放这部片子的时候，头一天夜里那些人就排长队等着买票。城外面仗打得凶，也没怎么影响北平城里这些人抢着看电影。还有《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》、《月宫宝盒》、《龙宫宝盒》、《蝙蝠怪人》，多啦。现在你别看电影这么变着花儿地拍，也拍不出人家那个水平来。我看外国片儿都不用翻译，一部电影看好几遍，看得多了，就知道他们说什么。

外国电影看了不少，中国电影我也差不多没漏，《十三号凶宅》、《青青河边草》、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、《松花江畔》，还有《天字第一号》，是抗日间谍片，女明星欧阳莎菲演的军统女特务，去给日本司令官当太太，日本司令部一开会，就通过佣人借端茶倒水的机会把内容全窃听出去。最后胜利了，都欢呼庆祝，蒋委员长还嘉奖这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女英雄。这片子我看了好几遍，从小就佩服做地下工作的特务。

有一回我看电影过半夜十二点钟才回来，不敢叫门进屋，怕我父亲知道，就跳墙，钻狗窝睡了一宿。清早四五点钟我妈起来了，问旁边屋里我嫂子：“小九回来了吗？”嫂子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啊。”我在狗窝里都听见了，也不出声。

不怕你笑话，我九岁就逛窑子，十一岁就“打炮”。你说九岁懂什么，十一岁懂什么？嘿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九岁那年我逃学，逛到了磁器口九道弯的妓院那条街，觉着怪新鲜的，就跑进去了。我四姐跟我一学校，她知道我逃学，回家告我妈了。那时候我们家住哈德门外，等我天黑回到家，一家人都在屋呢，我妈拿根棍站在门口说：“你给我跪下！”我跪在院里，我妈问我：“说吧，你今儿又跑哪儿去了？”我说：“逛窑子去啦！”大伙儿一听都乐了。我确实是“逛”了一回窑子，在里面东逛西看，也没人管我。大人在旁边故意逗我：“那你说说，你都看见什么了？”我说：“净看见大姑娘光屁股躺床上啦。”一院子人哄堂大笑。

我说的这还是在日本占领的时候，北平的人都没有挣钱的路啊，

一睁眼就想着这一天怎么填饱肚子。《骆驼祥子》里说拉洋车，人拉着跑的两轮车，可就是这拉洋车的能有多少呀？坐得起洋车的又能有多少人呢？那时候北平南城的马路边经常有“倒卧”，就是冻饿死的，俗称“倒卧”。大人一说，可别往那边儿去啊，地上又一“倒卧”。所以那些年在北平一条主要挣钱的活路，就是女人卖娼。在南城，从天桥到前门，你由南向北走，全是一间一间的小屋，挂一门帘，晚上亮盏小红灯，这种的叫“明门子”。“暗门子”就更多了。由东到西，从哈德门外到宣武门外都有。站路边见到男人就往屋里拽。你说身上就带五毛，五毛就五毛吧。全北平挨饿，百业都不行，好像主要就剩下“窑子”这一种买卖了。

再说我十一岁“打炮”。那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胡同有个人家，房东在家开赌场的，他设套，来赌的人净输。赌棍输得生气了，就把他家女儿办了。我叫她姐，比我大两岁，十三岁。有一回她跟我说：“昨天晚上那人把我拽过去，把那大家伙塞里了。”后来谁都玩她，家里人可能也睁只眼闭只眼。那天，她招呼我到屋里去，我说干什么呀？她说：“唉，小九，你来！”我过去问：“什么事啊？”她说：“咱俩也玩那个。”我能听懂点儿，说：“那有什么好玩儿的？”她说：“好玩儿着呢！”这么着，就在她屋里，挺难受，怪疼的，不玩儿了。我还跟她说：“这有啥意思。”

日本投降后，我们家来的那些当兵的去八大胡同逛妓院，我也跟着去看热闹。一进门，老板娘就问：“您是找熟人儿啊，还是现挑呢？”说现选吧。老板娘就叫：“小翠儿，出来！”出来了，给倒杯茶，走一圈儿。都没说话。又叫：“小红，出来！”也是添点儿茶，走一圈儿。当兵的说：“行，就小翠儿吧。”老板娘再叫：“小翠儿，接客！”领着屋里去。办完事儿了，当兵的说扣子掉了，也不知道是真掉还是假掉了，小姐赶紧趴床上帮着找扣子。你知道我干什么呢？我就拿根棍儿在后面捅屁股，捅得小姐乱叫。我都坏透了。

我不到八岁上学，到十三岁只混了个初小毕业证。就这么个证书，也是用我的聪明得来的，考试全是抄别人的。到初小考高小的时候，换个学校，我知道自己考不上，就找了个六年级的女同学去替我

考，当然我给她点儿好处。我平时给他们吃的，让他们上我们家来玩，他们都高兴着哪，所以帮我代考也没什么，再说也不用照片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，二百来号人我考个第一，我根本就不想考这么好。

上五年级我就成笑话了。高小第一天开学，我挺轻松地去上学。老师肯定发现了我考卷有毛病，第一个就问我：“你叫钮益惠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叫钮益惠啊。”他又问我：“你考个第一？”我说：“是啊。”老师把我叫到前面去了。他翻开书说：“你把这个念一遍吧。”我说：“不念。”因为我根本不会。老师生气了，说：“滚蛋！”我回到座位上，以为他就不爱理我了。没想到过一会儿他又指着我说：“来吧，我给你出一道算术题吧。”我看看确实是指着我，只好又到前面去。他在黑板上给我出了一道算术题：三斤六两减一斤八两，等于多少？

底下的人都伸直脖子看着我在黑板上算，谁不想瞧笑话？我看这题好像不难，数都不大，算吧。三斤六两减一斤八两，六减八肯定不够了，对不对啊。我从前面借一位，十六减八还剩八。这三斤借走一斤，还有二斤。减一斤，最后我得了个一斤八两。觉得没问题，幸亏这题还容易，也就小学二年级的程度吧，答完了挺高兴地站那儿。结果听见老师说：“得，你背书包家走吧，你永远也别来了。”我挺犯懵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心里觉得再不用来了，也不赖。

你知道这道算术题答得错在哪儿吗？我也是后来才想明白的。我们小时候就没有十两秤，都是十六两，借一斤等于借过十六两。你说当时谁脑子能想到那儿去？那时候师道尊严挺厉害，加上我被识破找人代考，不家走你说还能怎么办？就这么着，我五年级没上成。

虽然我没好好上学，但我从小上的是国民小学，唱的是三民主义国歌，背的是国父遗嘱，我还是个童子军队员。到现在我都能唱出《中国童子军之歌》。

你问了，上不成学回家不挨打挨骂呀？嘿，我妈最疼我，还觉得我受了委屈，对我说：“念不成就回家吧，赶明儿念私塾去吧。”哪个当妈的不觉得儿子好？我妈对我也抱着很大希望呢，花钱给我送补习班学英文。那时候送小孩子学英文也够可以了，到现在我还能背出

二十六个字母。

我家离东安市场近，那儿有个很出名的“小蘑菇剧团”，小蘑菇与赵佩茹比侯宝林厉害。后来为了积极表现，去慰问志愿军，听说小蘑菇死在朝鲜前线了。我妈当时就领我去看他们说相声，我挺喜欢，在旁边直乐，跟着模仿。人家说让师傅给这孩子收了学相声吧，我妈舍不得，要不然我没准儿早学出来了。可那时候说相声的都是下九流。其实我上小学，坐那儿俩人就能来一段儿，能编能说，不怵场。我从小就爱说，要贫嘴，但我妈不同意，她一到家就说：“这么好的孩子怎么能让他说相声去！”

电台

我哥钮益培在南京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朋友，叫刘景惠。老家是黑龙江的，跑出来参加抗日，后来在上海当匪警，相当于现在的刑警、特警吧，实际上他也是“军统”的特务。我哥把他介绍给我三姐。我三姐谁见了都说是个美人，她去了趟上海，见了上海警察局“空中堡垒”的队长刘景惠，他就成了我三姐夫。上海被攻破前，他要跟着往台湾退。三姐夫去台湾的时候，我三姐正好带孩子回北京娘家，没跟过去。看着国民党不行了，我哥也把我嫂子和孩子留在北平，自己说先去南京瞧瞧，后来情况变化太快，他又跑到上海，和我三姐夫一道走了。好像还是先到香港，又去了台湾。根本没来得及再回家说一声。

1949年的时候，我们家还住东单。10月1日新政权成立的时候，我们家里感觉气氛就不对了，反正都心里不痛快。我们就觉着他们打天下行，管理国家那差远了，肯定长不了，国民党早晚还得回来。我们全家从城里的大院子回到老家通县张家湾垛子村。到1950年，我家在东单牌楼附近新开路胡同的房子因为算国民政府的财产，都给没收了。

还好，村里土改那阵子，虽然我父亲没在家，但他人缘不错，成

分是按这时候家里有多少地定的，定了个贫农，因为我们家确实早搬城里了，在村里根本没留多少地。一给定贫农，我父亲就没遭遇什么事儿。至于儿子女婿在城里的情况，那时候与农村就跟无关似的。不过在我们村儿你就是地主也不臭，我们村儿不许说地主不好，包括对我们家，也都说是“钮善人”。

这年三月，我哥钮益培跟我姐夫刘景惠忽然从外面回来了。

我一看，他们都是做买卖的打扮。实际上我父亲知道，他们是从台湾派回来的。大人嘱咐我到外面不许说他们从哪儿回来了。我听他们在屋里悄悄跟我父亲说话，带来了不少消息，好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，国民党就要反攻大陆什么的。反正这时候我们净想好事了，把坏事就忘在脑后，起码相信国民党有回来的可能。要说我们还是太没政治头脑，我们的眼光差得太远了，你说是不是？

后来我听说，他们出发前，军统头目毛人凤亲自在台北为他们摆了酒席。其中的一个组四个人，老牌特务秦应麟被任命为中校组长，蒋中正签发的委任书，这组里面就有钮益培和刘景惠。他们从定海出发，在江苏的江阴偷偷登陆。当时舟山群岛还在国民党军队手里。

这当中据说还有个故事。毛人凤手下有个亲信秘书，也是办公室主任，叫潘其武，毛人凤死后就是他接的局长宝座。当时潘其武为了能接毛人凤的班，建议毛局长把秦应麟派回大陆。如果秦应麟这样经验丰富的骨干特工留在局里，有朝一日可能与他一争高低。毛人凤也觉得这次任务事关保密局在大陆的成败，非秦应麟这样能干的人出马不行，而且按他以往的履历，对平津一带很熟悉，他的家人包括妻子也在北京。

那天毛人凤找秦应麟布置任务。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，更是特务的天职啊。秦应麟虽然有顾虑，也只能服从，当然，另一方面他也想回去看看太太。考虑到我哥和我姐夫的家人也都在北京，就选派他俩，还有保密局精通电台的孙玉文，四个人组成潜回大陆的行动组。同时局里指派潘其武在台北遥控这个组。

据说出发前的小型酒席上，毛人凤指示，潜入大陆以后不要轻易行动，甚至可以视情况，几年以后再启用电台，在这几年中每个人都

要把自己的身份伪装好，备足经费，打好基础，做长期潜伏的打算。但实际上问题就出在这儿了。潘其武告诉秦应麟：“你们到北平后，由某某人从海南往北平运两车皮橡胶，你们接到之后以橡胶商的身份出现，这两车皮橡胶就作为你们的活动经费。”

秦应麟化名胡振远。我哥化名齐北光，有齐心合力叫北平光复的意思吧。我姐夫化名叫“彭振北”，意思也差不多。毕竟他们都是在册的国民党军警特，不化名也不成。我哥和我姐夫本来可能用不着冒这个险，他们要是不回大陆，后来什么事儿也没有，但是惦记家呀，父母都在家，我哥绝对是个孝子。再说要不是我嫂子、我三姐都没跟着去台湾，他俩也不会这么积极潜回大陆，毕竟也想媳妇想孩子。

偏偏不走运的是，本来安排好在岸上拿钱接应的人感觉大事不妙，卷着钱跑了，这个组的人一时抓瞎。为了方便行动，几个人分开走，大方向都是往北来，好不容易到了天津，之后又转到北京。根本就没有人按约定往北京发橡胶，他们没钱，寸步难行。权衡之下，也从安全考虑，决定把电台安在我父亲在通县垛子村的家里。我哥一表示有这个意思，我父亲二话没说就为他们做准备。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后来急于架起电台往台湾发报，向局里报告实情。但是这个组的台湾联络人又是潘其武，他回电说：“我们尽快再派人把活动经费给你们送去。”

就是这么一派人，招来了后面的大祸。

我哥他们到了不久，外面又来人了，大人不能去接，我哥告诉我：“小九，明儿上午十点你去双桥火车站接个人。给你请的家庭老师，姓孙。”就这么一句，很简单。

我就喜欢往外跑。第二天一清早，我赶了辆毛驴车奔北京东郊的双桥火车站。我兴奋，毛驴也跑得欢，没觉得多远就到了。车站很小，没什么人，一天也没几趟车。来车停站，下来的人中间有一个，我一看准是他：二十来岁，穿灰长袍，戴黑礼帽，挺精神挺文气的，确实像个年轻的教书先生。我过去叫：“孙老师！”他很和蔼地说：“你是小九啊。”帮他把大行李抱到毛驴车上。正好是春天，一路挺开心地说着话就回去了。家里已经把院子最里面西北角的一间房给他

腾好了。

我多机灵啊，大人不跟我多说，我也很快就能知道，孙先生名义上是我的家庭老师，实际上是派来的孙台长。他叫孙玉文，化名孙毓清。他在屋里架起了一套美制军用收发报电台，专门和台湾联系。我整天特愿意跟着他转，觉得可有事儿干了，而且肯定是大事儿。

我们先得解决电的问题。乡下没电，怕引起注意，又不敢出去买电瓶和大电池，他就打算用手电筒的电池给电台供电，到处找能连接电池的东西。他发现我们家有个红铜的大脸盆，觉得那个行，我就马上把它抱来。别说是家里人都在用的铜脸盆，只要孙台长觉得有用，再好的东西我也会马上抱来。

我和他把红铜脸盆剪成一片一片的，剪成的铜片长六公分、宽两公分，这么着把一箱子电池串联起来。天线也扯得老高，我登高爬低地帮着从房上架过去。村里人就是看见了也不懂，顶多就知道那是矿石收音机的天线。发报的声音“滴滴答答”挺大，但是那阵到处都乱，加上把它安排在院子最犄角的屋里，所以也没人注意到我们家的情况。

这部电台很笨重，每天孙台长都躲在屋里收发电报，很费电，我们进了好多手电筒的一号电池。联络的距离远，电池用一半儿就得换下来，要不然功率不够。为了作掩护，我们家在东单的市场摆了个摊儿，这样进货就不叫人怀疑了，还可以把那么老些用过一半的电池当旧货给卖掉。

因为孙台长是以家庭教师的身份住在我们钮家，所以他的安全就由我钮益惠负责。像你们听说的许多“红小鬼”一样，我这个“黑小鬼”就利用年纪小作掩护，开展“敌后斗争”。我是心甘情愿为他这个特务传递消息，整天忙前忙后，好多事也非得我办不可，小孩子跑来跑去的没人注意。我心里想着，我们家这就是在“为国尽忠”的最前线啊。

孙台长是一挺精神挺聪明的小伙子，还没结婚。这小伙子也挺能耐，在我们家什么都帮着干，我父母挺喜欢他，要再有个闺女就能许给他，可那会儿我四个姐姐都出嫁了。我的任务就是一直保护他，